

B2
G3862
2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
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葛兆光 著



A097800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2
ISBN 7-309-02992-5

I. 中… II. 葛… III. 思想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6212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9.75 插页 6

字数 1511 千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第一编



引言 权力·教育与思想世界

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在《隋朝(581—617):中国的统一》一书中,曾经以隋代历史证明,当隋代皇帝从北周那里夺取政治权力的时候,曾经用了伪造遗诏,自己加九锡却叫前朝皇帝颁退位诏书,在郊外举行天子亲耕仪式,以及伪造图讖等等程序,以建立新皇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他指出,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只有被普遍遵奉的文化规范所支持,政治支配才能成功,政府行为也才能被普遍接受,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此作为皇帝,他必须重视以下事情,如普遍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标准的文字,所有建筑物的规则体制,更标准的音阶,必须普遍适用的新历法,关于实际生活的种种规范等等^①。

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

按照韦伯(Max Weber)的观察,权力拥有支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二是法制型,三是奇里斯玛型,但是,古代中国的皇权要比这复杂得多,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正是因为如此,要想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过程也相当复杂,比如要通过仪式证明自己得到“上天”的符命及其象征性的承诺,要获得上一王朝的臣服以拥有民众对新的政权的信任,要通过历史的书写获得传统的支持,要有一些顺乎时代的政策来赢得时间的绵延以保持政权的稳定,特别是要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指导力,当然,获得文化与思想的指导权力,从深层支持政治话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垄断经典思想的解释、建立教育与选举的制度,以及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系统和与之相应的文化

^① Arthur F. Wright《The Sui Dynasty: Unification of China, A. D. 581-617》,日译本《隋代史》,布目潮瀨、中川努译,135页,法律文化社,京都,1982。

风气①。

继隋代而起的唐代和上代一样，七世纪上半叶，唐代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是有相当深的忧虑的，特别是那个协助父亲从合法的隋朝那里夺取天下，又以并不合法的资格夺取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②，除了在政治上采用相当开明和有效的方略以建立业绩之外，也曾经用开拓边疆平定四夷，赢得天可汗称号的方式来建立威望，用抨击和贬抑隋朝旧臣的方式来确认君主毋庸置疑的正当③，同时，也采用了相当聪明的文化策略，如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力④，排定三教

七世纪上半叶，唐代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有相当深的忧虑的

- ① 参看韦伯(Max Weber)《支配的类型》，康乐中译本，允晨出版社，台北，1985。林毓生《思想与人物》149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3。关于国家的这种合理性和合法性一般的建立过程，可以参看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5。
- ② 关于李世民即位的合法性问题，他本人也曾经相当担忧，虽然在面对史官时也说“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意味鉴戒，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但史官真的记载了他于武德末年谋杀同胞兄弟而获皇位时，其实他也很在乎，曾经抱怨史官的记载冗长而含糊，并很暗示性地说了个杀害兄弟而为天下的故事，要求史官修改，“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见《贞观政要》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本，10页。又，请参看《旧唐书》卷二记载贞观十一年(637)二月的诏书，这是全面谋求合法性的表露。
- ③ 参看《旧唐书》卷二贞观二年六月关于“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的对话和关于裴虔通(因弑隋炀帝削爵)的诏书。34页。又，贞观七年关于宇文文化及等前朝臣的诏书，42页，按：此诏书《全唐文》卷五题作《禁锢乱臣子孙诏》，它把本来有助于建立唐王朝的隋之叛臣都统统贬斥，说“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又，贞观三年至四年间，决定打击突厥，七年制定《破阵乐》，九年打击吐欲浑，其实都有确立权威的意味。
- ④ 关于颁新定五经和五礼的意味，可参见本书第一卷第四编第七节的论述，又，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十四也已经指出，“唐人以诗赋为重，故《五经正义》既定，而经学遂荒，一代谈经之人，寥寥可数……”，213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双照楼本，1990；又高濂武次郎《支那哲学史》下册曾经说到，“今以《五经正义》为登第科目，故经说一定，争端以绝，或惟有以暗诵《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亦为人情所难免也”，赵南坪中译本《中国哲学史》，119页，暨南学校出版部，1925。

次序以提升政治权力在思想世界的权威等等^①。这些努力没有落空,于是在贞观十年前(636),当这个新王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渐渐建立起来,天子个人的权力象征性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时,他曾经相当自信而且自豪地宣布:

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帝,朕提三尺剑
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②。

经过数十年以后,新朝的皇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渐渐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时间也已经使人们渐渐淡忘了前朝旧事。特别是当《五经正义》撰修完毕,《贞观礼》和《显庆礼》已经颁布,《晋书》、《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以及《隋书》陆续写出,儒道佛的争论已经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逐渐平息,一个似乎是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制度规范以及新的历史被建构并叙述出来之后,唐王朝的合法性就完全确立,特别是继承了隋代制度的教育、考试和选举制度,借助权力建立了常规的世俗利益与经典的知识话语的联系,把一种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知识阶层的晋身必由途径,于是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就成了拥有权力的话语体系,真的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③,这时,一个新的政治与文化的合理性也终于获得了支持,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④。

① 排定三教的次序,以确立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可参见《全唐文》卷六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诘沙门法琳诏》等。

② 这是贞观九年的事情,见《新唐书》卷二二—《西域上》,3233页。

③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3页。虽然这段记载未必是历史真实,但很有象征意义。和唐太宗这句志得意满的话相映成趣的,是士人无可奈何的叹息:“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同上,卷一《散序进士》,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参看宫崎市定《科举史》,他在《绪论》中指出科举对瓦解六朝贵族制度,确立新的官吏选拔制度,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意义,但是并没有讨论它对思想与学术的影响,后来的科举史研究者也大体相同,载《宫崎市定全集》15卷,11页,岩波书店,1993。关于唐代科举和教育情况,参看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阎文儒著、阎万钧校补《唐代贡举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记载贞观六年(《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云二年,4941页)“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5636页。为什么李世民要特意改变唐高祖立周公祠的做法?也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事件,但它的深层意义似乎尚未有很好的研究和诠释。

可是,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是大幸,也暗含着不幸。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有一个最终合理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又有一种非常圆满的解释系统。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世界的中心,就是在论证和建构这种解释的系统:它需要说明,天地的空间和时间格局,帝王与帝国的政治结构,人间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然的万事万物,是如何完美地被纳入这一秩序中的。当国家分裂、民族危机、道德紊乱等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在普遍混乱的社会状况下,这种以“秩序”为中心的思想曾经有深刻而尖锐的批评力,也拥有不容置疑的理想、真理和正义。但是,当一个朝代建立起来,不仅“四海承平,夷狄朝贡”,而且“万民富庶,朝政清平”,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的时候,似乎思想的使命结束了,因为思想似乎失去了批评的对象,于是,它会迅速地沦为一种依附于经典的知识,并在考试制度的挟迫下,被简约化为一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式,只是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①。

“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垒集京师”^②,知识阶层在海内承平、天下一统的时代,逐渐失去了或放弃了对前程的自由选择空间和思想的自由阐述余地,只能拥挤在这个狭窄的仕途上,而当唐王朝又

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是大幸,也暗含着不幸

① 《通典》卷十七记载,上元元年刘峤上疏“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406—407页。又,天授三年薛谦光的上疏更激烈,说“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夫觅者,自求之称,非人知之谓也”,410页。赵匡《举选议》中说到,“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微问,不立期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明经读书,勤苦已甚,其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419页。《通典》卷十七《选举》之《后论》中说,“夫人之为学,帖易于诵,诵易于讲,今口问之,令有讲释,若不精熟,如何应对?此举其难者,何用帖为。且务于帖,则于义不专,非演智之术,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职,而待以童稚,于理非宜”,428页。

②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5636页。

整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被“考试”这种所谓的智力较量所控制

相对比较地多门径宽松取士时^①，士人们就更把知识与思想集中在考试所涉及的范围。南朝后期，一个叫做徐旷的人，还敢于批评大儒沈重的学问是“先生所说，纸上语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见者，尚何观？”^②但是，这个时候的士人已经无暇沉潜于所谓“奥境”，整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被“考试”这种所谓的智力较量所控制，这种智力较量不是人与人的公平较量，而是在权力的笼罩下，向权力表白自己的臣服。没有进学时，如秀才考试，“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明经考试，“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开元礼考试，“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而进学之后，十天一考，“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年终大考，“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三次得下者，要罢归。利益、前途和理想，一面是动力，但一面在这里也成了沉甸甸的压力，知识阶层的知识和思想被束缚在这种考试上^③。所以在唐高宗时代，这种参与智力较量的表面公平已经出现问题，“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大率十人竞一官……”^④，到了永隆二年（681），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已经感觉到，

- ① 据《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记载，唐高祖时，就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课诵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1163页），从科目上看，唐代选举“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而它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此外有制举，“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1159页），科目是不少的。从人数来看，按照规则，当时的进学人数是：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三十人，算学三十人。而按照地域则是：京都学生八十人，上州六十人，中州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人数应当是不少的。
- ②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5638页；又，《旧唐书》卷一八九，4943页。
- ③ 如《通典》卷十五也说，因为“日月寢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微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361—362页。
- ④ 《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1175页。

“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①。可是，到了开元十三年（725）以后，官方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吸纳知识阶层的官僚制度，也形成了一整套控制知识阶层的考核制度^②，以各种庞大的图书汇集、类书编撰等形式，对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了归纳，而唐玄宗对于《孝经》、《金刚经》和《道德经》的注释，更用简约的传统方式给人们暗示了三教融合的大团圆，也以此标志了思想的边界。所以，后来的沈既济说，开、天之间，四海承平，“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徵文射策，以取禄位……”^③。

唐玄宗对于《孝经》、《金刚经》和《道德经》的注释，暗示了三教融合的大团圆，也以此标志了思想的边界

这时，确实是“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我们来看一下八世纪前期的社会状况：开元十年（722），置花鸟使采择天下丽人人后宫^④，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⑤，开元十七年（729）玄宗于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立千秋节，开元十八年（730），又令百官在春天放十天假，“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⑥，京城沉浸在一种侈糜的风气中，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记载，唐玄宗开元时代“治鸡坊于两宫间，素长安雄鸡……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所以，有人说是“生儿不

①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1163页。《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记载也为永隆二年，354页，中华书局，1988。有时士子为了考试而考试，就会寻找捷径，如《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记开元八年七月，李元瓘上书中说，那些明经科的人“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但是《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则没有人学。355页。

②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以后，文人职务已经相当庞大而且细致，比如从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一直到书直、拓书手、画直、装书直等等，而集贤殿书院即原丽正书院的考核制度也相当完整，如对文士按月终、年终进行考核，依据勤绩与政绩，由修书使登记上报。

③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358页。

④ 见《新唐书》卷二〇二《吕向传》，5758页。

⑤ 《通鉴》卷二一二，6766页。

⑥ 《通鉴》卷二一三，6786—6788页。

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①，而陈鸿《长恨传》也记载，自杨贵妃受宠，“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所以，也有人说是“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欢喜”、“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②，至于士人，虽然不能像斗鸡者流那样暴富，也不能像杨家有女那样骤贵，但同样也由于仕途大开而沉浸在风流富庶的生活中，赵昌平在《开元十五年前后》中曾经指出，开元年间，侈豪之风开始，“宫廷官场的侈豪之风，很快波及民间”^③，并引《开元天宝遗事》的“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④。其中王元宝在家中设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砧硃瓮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来吸引四方宾客，“所至如归”，这些依傍在豪民或贵胄周围的士人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批判精神与独立意识，也不再能够对这个已经烂熟的社会进行诊断和批评。整个社会的士人，大多沉湎在浅薄的满足中，他们热情地歌颂时代的安定、生活的富庶，歌颂帝国的威加四海，却很少有人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看到隐含的危机。尽管有人曾经用“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为题，针对杜甫《饮中八仙歌》进行社会思想的分析，指出只有杜甫“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对当时社会的危机有了警觉^⑤，但是，我应当指出的是，就连那个似乎醒着的杜甫，也无法对这个社会的弊病开出疗救的药方，因为他所处的八世纪，整个思想世界尚未曾寻找到有效的药方^⑥。可是，当一个时代失去了诊断和批评目标的时候，知识作为筹码，思想成了装饰，语言则在游戏

① 《太平广记》卷四八五，3992—3993页。

② 《太平广记》卷四八六，3999页。

③ 其实可能这种风气的转移更早就已经开始了，《旧唐书》卷一〇〇《毕构传》引唐睿宗的话就说，“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渐替”，3114页。

④ 《开元十五年前后》，《中国文化》1990年2期。

⑤ 《程千帆诗论选集》199页，张伯伟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⑥ 陈弱水在《思想史中的杜甫》一文中，曾经认为杜甫的“思想其实属于较新的形态，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部分”，其中特别是“以儒家价值的实践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标志着他作为中唐儒家复兴的先驱人物，但我并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因为这种用诗文表达的“公众话语”，依然只是一些泛泛之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六十九本第一分，台北，1998。

第一节 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的知识与思想状况

755年以后的安史之乱可能是唐王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①，不过，在思想史上，这一政治史上的事件只是一个便于记忆的象征，在历史的记忆中划分着两个不同的时代，而实际的思想史变化，大约绵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旧时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概在任何思想史上都可以算是普遍真理，除了天才思想家的划空而过，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演变其实都是很缓慢的，需要长时段才能显现出来它的意味。因此，尽管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深刻转型的大轮廓，是在以后一个世纪才逐渐浮出地表，但是，转型的征兆却早已在这个世纪凸显。于是，我仍然要从八世纪上半叶开始，追溯后来那一次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深刻转型的背景历史。

八世纪初的唐王朝，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次思想与秩序的双重危机。武则天取代李氏天子，以大周换了大唐，不可思议地以女子之身当了皇帝，“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②，不仅传统的“妇人不得预外政”已经失效，就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宇宙论依据^③，似乎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改朝之后的大周，“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作为王朝依据的五行五德五色象征，也已被改变以迁就新的权力，而象征王朝在天文时间中合理性的历法，也在载初元年被改变，“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符瑞常常是上天眷顾的暗示，原来传说上天曾降符瑞给李唐，如今却降给了武周，一块后来被称为“天授圣

755年以后的安史之乱可能是唐王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① 这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如陈寅恪先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时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金明馆丛稿初编》，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 参见《新唐书》卷一二〇《桓彦范传》记其在中宗复位后的上书，4311页；又，《旧唐书》卷九十一，2929页。

③ 《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7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象征着传统思想与秩序即将面临的天崩地裂、日月颠倒

图”的石头在洛水被发现,据说上面写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连历来象征与天地神灵沟通而且获得上天认可的明堂大祭,也由武氏亲自举行过了^①。与此同时,“道在释前”的原则改成了“令释教在道法之上”,思想的界限已经混乱;过去相当严格的取士途径,也突然变得非常宽松,一大批并非贵族子弟的士人,从边缘进入中心,使过去等级清晰的贵族社会及其建立秩序的礼法、传统的伦理与道德也渐渐失去了约束力。在那些年,这个强悍的女性曾经把“天”、“地”、“日”、“月”等字都改了写法,这仿佛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传统思想与秩序即将面临的天崩地裂、日月颠倒^②。

虽然,这一切在八世纪初似乎已经停止,神龙元年也就是705年,唐中宗复位:

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③。

但是,事实上思想和秩序崩坏的惯性依然存在,它并没有随着“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的恢复而重新恢复到原来的轨道。只要看看发生在八世纪初的以下故事就可以明白:原来深通儒学的学术领袖孔颖达曾经担任过的国子祭酒一职,神龙元年(705)由一个叫做叶净能的道教信仰者担任着,思想世界的主导权仍然混乱;尽管有人在武氏死后一再引经据典地强调“王者发号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恶恶明也”^④,而武三思居然还可以为所欲为,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善恶是非的伦理似乎一方面失去了舆论的制约力,一方面也失去了普遍的适用性;安乐公主自己可以“卖官鬻狱”,而且可以“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政治秩序在这种挑战下,也已经如同儿戏;而刚刚重登帝位的唐中宗在景云元年(710)带着一大批后妃到梨园球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朋拔河,韦巨源、唐休璟衰老,随踣地,久之不

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117—120页。

② 关于这一点,其实看看清代人写的小说《镜花缘》是很有意思的。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6583页。

④ 《新唐书》卷一一八《韦湊传》,4265页;《旧唐书》卷一〇一《韦湊传》在“必法夫天道”下多“使三纲攸叙,十等威若者”,意思更明晰,3142页。

能兴，上及皇后、妃、主临观，大笑”^①，随着君臣礼仪应有庄重与严肃的消失，过去奉行的“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的原则已经在这种戏谑中被瓦解了，稍后，本来拥有充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之间的嬗代，其实也充满了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这种颇显残酷的现象，使父子兼君臣之间似乎天经地义的伦理秩序，也在权力与利益的冲突中崩溃了^②。

八世纪初的中国官方并不是没有重建思想与秩序传统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唐玄宗开元时代曾经一度很强烈^③。开元二年（714），他不仅下令淘汰了万二千“伪妄”的僧尼，而且听从张廷珪和袁楚客的上疏，“宜崇经术，迹端士，尚朴素”，开元四年（716）又曾“殿庭策试”天下县令，使四十五个滥竽充数的人被迫辞官“放归学问”^④。在后来的若干年中，他又一再亲自出面，对最重要的明经与进士的学风进行整顿^⑤，而且令臣下整理四部图书，由元行冲编了《群书四录》，建立了丽正书院，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以为天下

①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6606、6608页，卷二百九，6640页。

② 关于这一问题，参看李锦绣《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载《原学》第三辑，161—16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③ 比如唐睿宗也曾经连下《减励风俗诏》、《申劝礼俗诏》，批评“人怀弛慢之心，官无警觉之意”，“樽俎之仪不习，冠婚之礼莫修”，但并没有什么用处。《全唐文》卷十九，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关于这一点，很多历史著作都把它算是唐玄宗执政初期的励精图治，却没有把它看成也是传统贵族社会一次思想与秩序的回光返照，因为学界常常把从武则天到唐玄宗的盛唐看成一个庶族士人或外廷士人崛起的连续过程，所以并不太注意这一段时间的特别意味，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似乎只有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第七章中提到“八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中文本，3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④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6694、6695页。《旧唐书》卷一〇〇《卢从愿传》，3124页。

⑤ 他曾下诏批评当时“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见《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等，《全唐文》卷三十一，146页。而当时执政的宋璟对李邕、郑勉及元行冲的贬斥性评语，如“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等等，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保守取向，《资治通鉴》卷二一二，6734页。

表率^①。其中,特别是为了重新确立思想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一系列象征性举动,如开元九年至十三年间(721—725)命令僧一行重新制造新的历法,南宮说重新测量天地,制造水运浑天,对王朝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象征性依据宇宙天地重新加以确认^②;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封禅泰山,“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祭皇地祇于社首……幸孔子宅致祭”,对国家奉天承运的神圣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再次加以强调^③,开元二十年(732),《开元礼》修定,在祭祀中,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而祈谷、大雩和明堂的仪式,都要祭祀昊天上帝。他似乎终于完成了对“天”与“人”的秩序的重建,宇宙、神灵与人间帝王之间的秩序,似乎再次在国家礼典中被固定下来^④。

这是一个传统的知识与思想已经失去了魅力的时代

可是,《开元礼》大体只是《贞观礼》和《显庆礼》的翻版,封禅和祭孔虽然依照旧制强调了上天的旨意和思想的权力,但它也只是旧戏重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6756页,后来改名为集贤院,同上,6764页。又,可参见《旧唐书》卷一〇二《马怀素传》、《褚无量传》、《元行冲传》,3164、3167、3176页。

② 闻人军、李磊《一行、南宮说天文大地测量新考》对这一次唐代政府行为的背景和过程作了相当仔细而且深入的研究,但是没有涉及它的政治象征意义,《文史》三十二辑,93—103页,中华书局,北京,1990。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6766、6767页。关于封禅在古代中国的形成历史以及它在政治与思想史中的重要意义,现在各种思想史著作讨论得并不充分,至少思想史的忽略与封禅在古代中国的隆重这种反差,让我很诧异,其实,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封禅说の形成》中已有详细的研究,他指出战国末期形成的封禅,本是齐国方士以泰山古祭为原型创制的,作为帝王的祭祀,它在后世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政治宗教性的新意味。见《东方宗教》第七号,63页,日本道教学会,1955;关于它在唐玄宗时代的意义,可参见《新唐书》卷一二六《张九龄传》,张氏指出“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盖敬天命,报所受也”,并且引徵了周、汉的历史来强调这种“以迎日之至,升紫坛,陈采席,定天位”的象征性仪式,对于确认王朝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增强国家凝聚力,以及重建秩序的意义。4424—4425页;又《旧唐书》卷九十九,3097—3098页。此外,从唐玄宗封禅时的玉牒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意图,“天启李氏,运兴土德……恭成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等等,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198页,中华书局,1984。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6798页。

演,重新测定的天地和重新厘定的历法,虽然按照旧的思路它在政治层面确认了王朝的合理与合法性,但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已经引不起任何新的兴趣。这是一个传统的知识与思想已经失去了魅力的时代,正如我在《引言》中说的,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处在“盛世的平庸”之中,不必追究唐玄宗个人作风的转变,其实这是因为主流知识思想已经不再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于是它也不再具有判断当时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在一整套精致而华丽的语言技巧中,知识阶层勉强翻空出奇,维持着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就像唐玄宗自己说的那样,“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①。可是,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八世纪上半叶,过去作为边缘的佛教、道教,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异族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风行的时尚,仿佛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句话说的一样,“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②,支脉对主流,边缘对中心,已经形成了无言的威胁。

支脉对主流,边缘对中心,已经形成了无言的威胁

在尽管总是被誉为“盛世”,却被过去思想史或哲学史当作“空白”,而在教科书中被轻轻放过的八世纪中^③,我提醒读者注意以下一些也许对当时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有并不剧烈但很深刻影响的现象。

首先,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与简化。历史似乎有这样的

首先,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与简化

① 《将行释奠礼令》,《全唐文》卷二十,97页。

② 《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十三经注疏》2249页。

③ 对于唐代思想,尤其是七至八世纪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很多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中几乎是空白。参看本书导论(下)第一节《无画处皆是画》的讨论。

惯例,大凡主流知识与思想已经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了垄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考试的内容、升迁的依据,并与个人的利益直接发生关系时,这种知识与思想会很快成为一些教条,并很快地简约化成为一种供人复述与背诵的内容。同时,传递与复制这种僵硬而且教条的知识或思想的简约化文本,也会很快随着教育、考试与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大量被传抄、背诵。尽管也有人一直相当固执地恪守传统文本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比如曾经执掌文柄的张说,就极力反对把传统礼类经典进行分类改编,痛斥“以类相比,有同抄书”,“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但这种高贵的保守态度毕竟止不住普遍的世俗需求^①。富于诱惑力和影响力的科举考试对士人的知识与思想的趋向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当时明经的考试制度,“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进士的考试制度,“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②,而且那些考题的范围与评判的取向,也常常在向士人暗示着一种学术与思想的导向,例如那个时代被视为最优秀人才的进士试中,题目引导着应试者挖空心思凭虚想象、搜尽枯肠堆砌词藻,而限定的韵脚,则有意无意地限定着思想与内容的取向,至于文词雅丽科与博学宏词科的题目,也同样引导着这种知识与思想的装饰性质^③,就连对于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贤良方正科、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科的对策的

① 《旧唐书》卷一〇二《元行冲传》,317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6784页,《全唐文》卷三十一唐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146页。《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中说到,当时吏部出题考试,先是以选取官吏的方式,“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后来应试人多,觉得“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于是就考“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后来人更多了,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361页。

③ 以开元、天宝年间为例,进士科的题目是《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开元二年)、《丹甌赋》(以周有丰年为韵,开元四年)、《止水赋》(开元五年)、《北斗城赋》(以池堂生春草为韵,开元七年)、《黄龙颂》(开元十一年)、《考功箴》(开元十四年)、《冰壶赋》(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开元十八年)、《梓材赋》(以理材为器、如政之术为韵,开元二十二年)、《花萼楼赋》(开元二十五年)、《拟孔融荐弥衡表》(开元二十六年)、《罔两赋》(以道德希夷为美为韵,天宝六载)、《豹鸩赋》(天宝十载)等等,文词雅丽科的对策,存开元七年邢巨等人的五篇,博学宏词科,开元二十二年的题目是《公孙宏开东阁赋》,现存王昌龄等四篇,可以从中看到的是追求表面装饰性的文词的导向。

取舍,也同样以文章论优劣,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色彩^①。于是,正如赵匡《举选议》中说到的,“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②,当更多的普通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拥有文化贵族那种从容不迫的阅读闲暇、不计功利的经典素养、世家大族的文化传统,而急切需要能够应付考试以换取利禄的实用知识的时代,旧的知识很难避免遭遇这种被教条和简化的命运^③。

知识很难避免
遭遇这种被教
条和简化的命
运

举一些例子。在七世纪以后曾经流行着各种关于各种人际交往、礼数规则的礼仪手册,现存的这类书中,虽然只有 P. 3900 与 P. 3681 被确认为七至八世纪之间,但我相信这种简约的礼仪手册在八世纪也曾经非常流行^④。本来,每个士人都必须阅读的经典中,《仪礼》有“乡饮酒礼”、“士相见礼”,《礼记》也有“少仪”、“内则”、“乡饮酒义”等等,但是在那个时代,那种对符合身份的礼仪十分自然娴熟的贵族世家已经不多,更多的人在相对财富与身份有所依凭的情况下,只是需要模仿贵族世家的高尚典雅,于是需要一些便于背诵与记忆的简约条文,一方面提醒自己维持身份地位,一方面应付各种临时场合。正如后来的《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时景仪》的序文中所说的,“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临时仓猝,目不知所措”^⑤,

① 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开元天宝年间的对策,现存开元二年的三篇;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科,开元天宝年间的策问现存,对策存有开元九年的二篇;贤良方正科的对策,现存开元十四年的二篇,均见于《登科记考》及《全唐文》中。

② 《通典》卷十七《选举五》引,419页。

③ 从张由古不知“班孟坚”为“班固”,到萧晔把“伏腊”读成“伏猎”,说明学风已经大变,而主持选举人才的吏部侍郎姜晦则“眼不识字,手不解书”,以至于人用“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前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来讽刺,更可见这种不学无术风气的严重,见《大唐新语》卷十一,171页;《新唐书》卷一二九,4483页。张鹭《朝野金载》卷四,90页,《隋唐嘉话·朝野金载》合刊本,中华书局,1979。

④ 参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此书所称“书仪”,“怀疑以书仪为名兼包书札与礼仪两方面内容”,即包括作者所称的朋友书仪和综合书仪,前一类是供士人写信作范本用的,后一类是供士人之间交往作准则用的,我这里姑妄把第一类和第二类用较通俗的称呼称为“尺牍范本”和“礼仪手册”。

⑤ 参见那波利贞《中唐晚唐时代に於ける接客辞仪类の著書の出现に就きて》,日文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第九辑,大阪,1953。